维新以后被称为汉诗史的衰替期，具体又分为明治、大正和昭和三个时期（73）。显然，这三个时期是根据日本政治的变迁而标目的。

在这一时期，存在着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即西方文化和思想进入日本。对于彼时西方文化对日本汉诗发展的影响，作者认为：由于西学的兴盛，日本的汉学研究步入衰微，而汉学地位的下降也影响到了汉诗的创作——比起江户和明治时期，大正、昭和年间的汉诗社团和专栏数量都有所减少（76）。从这一分析的结果看，将这一时期视作日本汉诗的衰替期似乎并无不妥。

然而，反观这一分析的论证，可以发现其中有过度简化的痕迹。

首先，这一分析对“西学”和“汉学”的定义模糊。而对这两者的定义关乎到“西学兴盛、汉学衰微”的判断能否成立。

广义上的西学并非维新以后才出现的新鲜事物。其第一次成规模地进入日本是在江户时期前夕，以宗教的面目出现——隶属圣依纳爵·罗耀拉（Societas Iesu）、沙勿略（San Francisco Xavier）等人创立的耶稣会的传教士们早在十六世纪就开始了在九州地区的布道。到了江户时期，以荷兰语文献为中心，兰学逐渐成熟，特别是世界地理研究的开展深入到了日本对外政策乃至西方制度的诸方面，为幕末洋学的展开埋下了种子【兰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 】。与此同时，反观该时期的日本汉诗，正是逐渐走入作者所谓“繁荣期”的阶段。由此可见，维新以后西学的兴盛并不能单独成为汉学，乃至汉诗衰落的基本背景。

作者所谓“汉学”，指的应该是：日本学界对包含汉文学在内的与中国有关的问题的研究。而这些“有关的问题”，具体来说，是以儒学为中心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此般定义下的汉学，曾确实在西方学科划分和教育思想影响下的教育改革中被排除在了大学体制和地方学校制度之外，丧失了其原先的地位（日本汉学史1，58）。如果我们将此前江户时期日本汉诗的主要创作群体——儒学者和当时繁盛的儒学研究作为视作比较和评价这一时期汉学的基准，那么以儒学为对象的传统汉学研究的确受到了较大影响。

然而，另一方面，如果作者看到了传统汉学的衰落，那么我们也应该意识到，随着西方学科的划分以及日本近代教育体制的成型，汉学中的文学逐渐和历史、哲学学科分开，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此外，汉文的读写能力也被纳入小学和中学阶段的考察（日本汉学史1，183）。可以认为，无论是专门的文学研究范式还是汉文教育的普及程度，比起前一个时期的江户，是不能以衰微去评价的。

其次，这一分析忽视了在这一时期国学与汉学的关系，乃至和文学与汉文学之间的关系，简化了当时日本思想和文学的状况。日本国学所涉及的内容，是以神道为中心的，兼及对古代历史书写、和歌和物语的研究（日本汉学史1，5）。国学派学者从非汉文的和歌以及物语中，提炼出“物哀”、“诚”（まこと）等美学范畴。这些理论方面的探索与日本歌人、徘人的实践一起，推动了和文学的内涵与形式革新。和歌的对话范围继而超越了汉诗，和西方诗歌影响下的新体诗产生了关联（日本诗歌史，394）。与和歌的勃发相比，日本汉诗从整体上来说确实未见多少革新。也就是说，近代日本汉诗的衰微，实际并非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汉学式微这一单一原因所导致的。更重要的是，从日本文学史的整体环境而言，日本汉诗以外的和歌、俳句等传统体裁的革新，乃至新诗、小说等新体裁的繁荣——在这些因素的环绕下，日本汉诗的地位受到了明显的冲击。而本书在此处的逻辑简化，是仅仅将日本汉诗放在日本汉文学，或是日本汉学的脉络下考察，而忽视了日本汉诗在日本文学史中的位置。